

一 艰难的起步

1. 潜移默化与新生的萌芽

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前有秦汉，中有唐宋，后有明清，中华民族长期居于世界各地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沿。就社会经济而言，历久弥精的农作技艺、水利设施、作物结构和集约程度，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还有小手工业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表现为分工的细致和技艺的精湛。所有这些进步，在当时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上，宋代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峰。

伴随着农耕与手工业行业的发达，我们通过宋代《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历史画卷，看到了当时商业的繁盛。商品化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逐步流通于地方性的墟集、城市市场、区域及全国性的大市场，有了铺坊加工、饮食

服务等的“坐商”，更发展出从事长短途贩运的“行商”。商品交易以粮食、棉布和盐为大宗，说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市场上的结合，是作为“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延伸出的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经济的扩大和发展，又将在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由前承汉唐盛世的宋代所后启的明清时期，确切地说是从16、17世纪开始，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水平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历史前提，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结论依据于对明后期、清前中期农业及手工业各行业的细致考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手工业的技术规模、专业分工、资本构成、雇佣关系等，是历史研究的放大镜搜索一种经济“萌芽”的聚焦点。通过对这几方面的考察或许能够直接证明“萌芽”发生的地区和行业。

农业

福建武夷山产茶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

福建上杭山区的寮主雇箐民垦山

广东、福建某些地主经营的果木园

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

川陕富裕棚民经营的药厂和木耳、香蕈、

香菌厂

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

手工业

某些地方的制茶、制烟、制糖、酿酒和榨

油业

某些地方的造纸、木版印刷业

江苏、浙江一些城市的丝织业

苏州、松江的棉纺业、染坊业、踹坊业

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业，云南铜矿业

山东博山、北京西部的煤矿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

四川井盐业、河东池盐业、淮南海盐业

上海沙船运输业

从这些地方和行业中，不仅看到了真正受雇于资本的雇佣劳动，而且发现商人们采用发原料、收成品的包买制和出资雇工的雇主制等形式支配生产，手工业工场的存在及其对城乡的小手工业者的排挤和控制。自由雇佣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而在马克思看来，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的形成，构成了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起始途径。

鸦片战争后，上述手工行业中，陕西伐

木、广东冶铁、云南铜矿以及河东池盐、淮南海盐等业逐渐衰落；踹坊、刨烟、木版印刷和沙船运输业逐步淘汰；而制糖、造纸、染坊和冶铁、铸铁业得以维持下来；制茶、酿酒、榨油、丝织、制瓷、井盐、煤矿业则有较大发展。绝大多数有向机器工业过渡的趋势和成为近代工厂基础的实例。此外，砮坊、磨坊、缫丝、轧花、织布、制革、砖瓦等以前未见萌芽的传统手工行业，以及新产生的一些手工行业，也先后开始采用机器或机械动力。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在鸦片战争后并不是突然中断或全部停滞，而是继续成长，并显示出其代表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主流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它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现成的熟练工人，准备了市场和运输条件，以及一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例如，1845年广州柯拜船坞作为中国最早的外资工厂之一，就是收买中国原有的手工船厂的泥坞而建立的，它还实行包工制雇佣中国的技术工人；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是第一家洋务派官办工业，也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基础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1869年上海发昌机器厂，也是由手工业工场采用车床而变为机器工业的。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出现于封建社会晚期的

新生事物，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和进步的历史作用，但也应看到另一方面的的事实，即自 16、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在近 3 个世纪的长时期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犹如熹微的晨星，其在农业中的萌芽极其缓慢，而手工业又大多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特别是不论在古近中外都居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棉纺织业，难以出现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反而成为“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牢固支柱之一。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水平和积极意义微不足道，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步伐。在跨越近代历史的门槛之前，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和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远远没能达到与自然经济相抗衡，或者滋长到拔地而起的程度，萌芽始终只停留在幼小的状态。所以，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影响，依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假设，资本主义终将在中国出现。但是，这一由萌芽到壮大，由男耕女织走向大农业和近代工业的进程，将非常艰难和漫长。

2. 国门渐开与外来的冲击

两次鸦片战争，是崛起两个世纪的西欧资

本主义对蹒跚徘徊的东方封建古国的挑战。一向推行重农抑商、严格限制海外贸易、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在战场上一触即溃，屡战屡败，逐渐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和愿望。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首开恶例后，被迫与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但无力阻止白花银两换作黑森森鸦片的罪恶贸易，更进而开埠割地、赔款求和。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半的主权，从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披枷戴锁、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血与火交织的过程。对于西方侵略者来说，用炮火打开中国的国门，意味着为本国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找到了可供侵蚀和吸吮的巨大躯体。在获得种种的政治经济特权后，他们对照这里众多的人口，盘算着能够倾销出去的刀叉、钢琴、衬衣和睡帽的数量，算计的结果颇为如意。以此为例推及其他，则前景十分诱人。然而，正如清朝天子以为离开中国的茶叶，西方人会因肉食过多而生病的想法一样，这种计算的误差在于不够知己知彼。生活在由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稳固结构中的中国人，近乎完全自给自足，他们对市场的需求和购买

力都极其有限。即使偶有需求，也是依从生活习俗，倾向于选择本国手工业和商业所供给的筷子、锣鼓和布袍之类。自然经济曾经严重束缚了本国商品经济和新生萌芽的发展，在与外敌交恶的数十年里，它也十分有力地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

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将外来势力的破坏和冲击概括为：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对于自然经济而言，就是要摧毁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其暴力手段包括了继军事暴力之后的经济侵略，表现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60 年代前的中外贸易，西方列强继续使用鸦片倾销以补偿逆差的方法。其数量由 1840 年的 20619 箱增至 1860 年的 85681 箱。对外贸易额，1871~1873 年年均进口 10600 万元，出口 11000 万元；1881~1883 年年均进口 12600 万元，出口 10800 万元；1891~1893 年则年均进口 21900 万元，出口 16700 万元。进口显著递增，入超愈加严重。商品结构上，进口鸦片很快被棉布、棉纱、钢铁、石油等工业产品所代替。出口茶叶则为丝、棉、毛、豆等原料所代替。商埠是经济侵略的基地，至 90 年代已增开至 30 余处，

范围也由沿海、沿江而深入内地，甚至伸展到一些边远地区。外国人在商埠中据有租界，设立洋行、商行、工厂，进而控制或独占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业，利用遍布各地的中国钱庄、商号形成掠夺原料土产和推销商品的庞大网络。他们还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就地开设工厂牟取在本国难以获得的高额利润。至 1894 年，外资设厂超过 80 家。

经济侵略的结果，首先是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纺织品、针钮、肥皂、灯烛、钟表、玩器、药材等花样翻新的“舶来品”，通过挣扎求生的国内商业的贩卖，往往能流行于通商大埠乃至穷乡僻壤。当时的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写道：“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这种景象的背后，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两个方面：耕织结合的分离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耕织分离主要是由于进口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以致洋纱破坏土纺、洋布排挤土布。这种分离包括植棉与纺纱分离，纺纱与织布分离，纺织与农业分离等几个层次。各种工业品的蜂拥而

入，则排挤了中国城乡简陋的手工业制品，原料与市场的丧失，使相当一部分行业迅速败落，许多行业不得不脱离与农业的紧密联系，另寻生路，有的转而从机器工业靠拢，充当加工、修理等配角。资本主义对入侵地域原有生产方式的破坏和摧毁，在为自身扫清道路的同时，造成了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新的行业技术和方式开始出现和渗透。社会财富和资源无形中改变了原有的流向和配置，中国的社会经济正被迫经历着亘古未有的大变动。

3. 兴办洋务与创业的启蒙

60年代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交迫的时期。“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和以身殉国的勇将，并不能挽回中外战事的败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朝野上下一片震恐。社会动荡不安加剧，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起义此伏彼起，1851年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朝中文武一筹莫展。外军的坚船利炮和新式火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一些靠“御侮平乱”有功起家的，握有兵权的达官权贵、封疆大吏，痛定思痛之余终于意识到技不如人，开始承认落

后与先进的现实差距。他们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希望“师夷长技”，移植国外的先进技术，使经过整顿的正规军拥有新式的装备，并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财富作为强化统治的后盾。正是从 60 年代开始，由这些官僚主持了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活动。当时，凡政府办理涉外事务通称为“洋务”或“夷务”，上自恭亲王奕訢的一批醉心和致力于新式兵器、军制、路矿等的大官僚，被统称为“洋务派”。至 90 年代甲午战争，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洋务运动，持续了 30 多年。

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主题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期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练兵制器”、筹办“海防”以求“自强”。1861 年湘军鼻祖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罗致华蘅芳、徐寿等一批科技人员，研究仿制西式开花炮和小火轮，为兴办洋务军事工业之始。1863 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先设一座备有“制造机器之机器”的“母厂”，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母厂所造机器不应限于专造枪炮，而应“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之物”。曾国藩同意后全权委托容闳携 6.8 万两赴美采购机器。容闳的这一办厂

计划可谓有远见卓识，对于洋务运动突破单纯注重军火制造的狭隘思路具有深远意义。容闳圆满完成的此次采买专差，成为中国历史上有计划地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创举，促进了洋务的继续兴办。

1862年，淮军领袖李鸿章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次年在苏州设立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主持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兼造枪炮、轮船和各种机器。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充为金陵制造局。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福州船政局，建马尾船厂专造轮船。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风气一开，上行下效。地方官员也陆续在西安、福州、兰州、广州、济南、成都、吉林、杭州、台北、昆明、汉阳等城市开设了一批中小型的军火工厂。1861~1890年，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企业总计为24家。

上面提及名称的这几家企业，由于主持者的尽心竭力和好大喜功，因此各有侧重和专长，它们设备精良、规模巨大，平均经费在1000万两以上，是军火工业中的龙头。虽然在资金来源和产品分配等方面，依然沿袭以往官营手工业的做法，但它们以大量直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为起点，雇佣和养成了一批熟练技

术工人，在生产和管理上就不得不采用一些新方法。因此可以说，它们已基本具备了机器工业的特征，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第一批本国近代工业，作为国家资本的最初形态而载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以“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比兴办军工以求“自强”的活动晚 10 年开始。第一批军事工业创设和运行的过程，一直不能摆脱经费不足的困扰。这是因为清政府疲于应付连年的内外战争，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财富的外流，使得国民贫弱财政匮乏。另一方面，军事工业本身的设备、材料甚至燃料都大量依靠进口，不但仰赖外人，而且开支巨大。洋务派意识到“自强”必须有相应的财富来源作为基础，李鸿章就明确地上奏皇帝说：“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同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及他们迫不及待地插手中国路矿电信业的企图，也给了洋务派很大的刺激。因此从 70 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经办军工的同时，陆续创办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一批近代民用工交企业。

1872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1876 年两江总督沈葆楨在台湾开办基隆煤矿；1877 年李鸿章

在河北开办开平煤矿；1878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1879年李鸿章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李鸿章创办天津电报总局；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开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织布局。到90年代为止，近代民用洋务工业的数量达到30家，以上述几家最为重要和典型。

如果说洋务派“自强”“求富”的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下，不自觉地引进和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民用工业在资金来源、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范围规模等方面，比军事工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用工业的兴起，不但是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弥补其单打一的缺陷，而且产生了由进口替代走向形成洋务工业自身体系的趋势，其总体规模已大于外国在华企业。企业由完全官办转向以官督商办为主，还出现了官商合办的形式。官督商办是由官方垫资，然后指定商人向社会募资，经营中逐年归还垫支的官款。官商合办是官商双方按合同认股，依股份比例分负盈亏，商人名义上与官僚共同管理企业。在概称为“机船路矿”的各行业中，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要求培养和训练大批的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些受雇的自由劳动者人数在2

万以上。由于从产品配给转变为从事专门的商品生产，追求利润成为企业经营的明确目的，开始有了成本利润核算的必要和制度，企业在组织上也仿照资本主义公司企业的形式。

洋务企业有很多的缺点，比如其封建性、买办性和浓重的垄断色彩。它不能完全摆脱对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的依赖和妥协，企业的总办、帮办、坐办和提调等职位都由洋务派大官僚一手掌握，商股代表相比之下人微言轻。因此官僚制度的痼疾在企业中暴露无遗，用人不当、决策失误和经营失败、贪污舞弊等现象比比皆是。作为官方主持的企业，它拥有减免税收、贷款缓息等种种特权和行业性垄断的办厂“专利”，压制了民间资本的独立发展。此外，在“自强”的迫切愿望驱使下开始的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道路，既与传统经济相脱节，又漠视和没有做到必要的积累，所以很难贯彻和持久。这些都是洋务运动未能给中国带来富强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尽管如此。兴办洋务实际上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作了不少的尝试。它造就出一批新式工业企业，由于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吸纳了社会中

的私人资本。将商人的责权和利益与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挂上了钩。这些企业有的破产失败了，有的作为遗产还有所延续和发展。甚至部分企业中的商股利益的代表力图摆脱官股强制，从而产生向民间私人资本企业转化的趋势。30年的成败之中有教训可汲取，有经验可总结。这对于稍晚开始创业的民族工业来说，无疑是一次现场教学般的启蒙。

4. 民族工厂与资本家诞生

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证实了中国并不是一块新生产方式的处女地，西方侵略者携带资本和技术设备乘胜而来的时候，发现很容易就能找到可供雇佣的熟练工人，包括纺织女工，从而开始机器生产，照样做他的资本家。丝毫不像他们在美洲或澳洲，带去的工人甚至侍候起居的仆人，一到那里反而纷纷弄块土地变成了小生产者。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外资殖民工业是这样建立的，洋务派工业也由官办走向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那么，商办工业即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然而，民族工业产生的途径却不是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它并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自然

和正常发展的结果。历史环境的不同，使得几乎与中国萌芽的出现同时开始的西欧资本主义，在 200 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的三个阶段。它急剧膨胀后的对外侵略，就不再允许被侵略者有同样正常的发展机会。从此，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像是稀疏地散布在一片熟土中的种子，更多地听命于气候条件的骤然变化。所以，尽管在民族工业产生伊始，出现过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厂过渡的少数事例；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形之后，又有大量小商人和作坊式工场主转变为企业主。但即使是在这些情形下，外来因素仍然起了主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已不是逐步过渡，而是强制淘汰和催熟的结果。总的来看，中国近代工业包括民族工业的兴起，大都是从利用外国输入的机器设备并模仿既有的企业创办经营实例开始的，在外国资本主义大举入侵的冲击和刺激下，越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

1869 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和 1872 年广东继昌隆缫丝厂，分别是由工场手工业转变和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两个典型例子。它们是最早出现的两家民族资本工厂。

上海发昌机器厂的前身，是 1866 年铁匠

方举赞和孙英德合伙，用 200 元资本开办的一家打铁作坊。起初的家当只有一座打铁炉，雇用四五个工人。作坊的对面是虹口外商老船坞船厂，主要业务就是为老船坞打制修配船用零件。1869 年，该厂开始使用具有工作母机性质的车床，生产规模和产品范围逐年增扩。1873 年起开始在上海（申报）上用“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的厂名作广告。1876 年后使用蒸汽动力，不但兼售英国制造的小型轮船，并且将制造整只小型轮船作为主要业务。进入 80 年代，由“能绘轮船图样，通晓机器，熟悉外文”的第二代业主接替经营。至 90 年代初发昌已有各类车床机械 20 台，分设木匠、制模、翻砂、打铁、冷作、车床、水汀炉（蒸汽锅炉）等车间，工人超过 200 人。在沪上商办工业界一时颇有名声。甲午战后，老船坞改归英商耶松船厂所有，发昌失去了一个老客户。1899 年，发昌作价 4 万元卖给耶松船厂。

发昌机器厂作为目前所知的第一家民族工业，能够由手工作坊迅速地转变成为机器工厂，与它诞生在 60 年代后日显国际化大商埠风貌的上海，与它所从事的船舶修配和制造行业，甚至与它最初业务对象的选择和确定，都有紧密的关系。后来的上海建昌机器厂、永昌